

国有经济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文/于春明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比重持续上升，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非国有经济比重上升的根本原因在于非国有企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效率（刘伟、李绍荣2001，刘小玄2000）。樊纲认为国有经济比重最终不会趋于零，而是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值（樊纲2000）。平新乔则从国有企业目标选择出发，构建了一个模型论证了国有经济比重的内生决定。（平新乔2000）。本文认为国有经济效率低下，关键是其投资效率低下；国有经济投资量和投资效率共同结合，影响着国有经济的比重，国有经济的均衡比重是由国有经济比重和国企相对于非国企的相对调节成本的大小共同决定的。

在投资量上，目前国有投资占社会投资的主体，国有投资量大于非国有投资量。产生这个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体制上的，而不是国有投资效率高于非国有投资。在投资的质量上，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是低于非国有投资效率的。

西方经济学认为，增加一单位的资本存量不仅要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还要增加一部分额外的成本，如安装新机器、训练工人操作新机器、管理人员的增加等，这些都要花费成本；还有短时间内大量投资，购买大量的投资品，会导致投资品的价格上升，这也额外地增加了成本。这些成本就是投资的调节成本。因此并不是全部投资都转化成资本，只能有一部分投资形成为资本。投资调节成本比较大的企业，相同的一笔投资量，其转化成的资本量就比较小。国企由于预算软约束，获取资金比较容易，投资亏损后又可以“欠债不还”而不用倒闭，有“国企是国家的，亏了归国家”的心理，必然会产生较大的投资调节成本。

由于国企的投资调节成本比非国企大，我们可以以非国企为参照物，假定非国企投资没有调节成本，非国企的投资额将全部转化成资本，也就是；而国企就会由于人为的原因，其投资额大于其资本形成额，定义（）/为一笔投资转化成资本的比率。在本文中，预算硬约束的非国企的为1，即非国企的投资全部转化成资本。国企的满足 $\alpha < 1$ ，即国企投资有 $(1-\alpha)$ 部分没有转化成资本。

二、建模分析

假定是两部门经济，无资本折旧，国企与非国企的生产函数相同，所有的国企同质，所有的非国企同质，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且满足 $\alpha > 0$ ， $\beta > 0$ ， $\gamma < 0$ ， $\delta < 0$ ，资本（或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都是正的，多增加一单位资本（或劳动），带来的产出增量是递减的。

假设为产出水平，为消费量，为国有投资占社会投资的比重， θ 为储蓄率，是一个常数。为劳动人口增长率，也是一个常数， L_0 为初始劳动人口量。为贴现率， $\rho < 1$ ，社会储蓄全部转化成投资，则总投资 $=I$ ，国有投资量为 I_g ，国有投资资本形成量为 I_{gk} ，非国有投资资本形成量为 I_{nk} 。

我们有 $\alpha I_g = I_{gk}$ ，人均资本，所以 $\alpha I_g = I_{gk}$ ，把 $\alpha I_g = I_{gk}$ ， $I_{gk} = \alpha I_g$ ，代入 $\alpha I_g = I_{gk}$ ，得到： $\alpha I_g = I_{gk}$

我们有社会最优问题：社会在预算约束 $\alpha I_g = I_{gk}$ 下追求一生贴现的效用最大化而如果假设效用函数是一次齐次的，那么

预算约束 $\alpha I_g = I_{gk}$ 和预算约束 $\alpha I_g = I_{gk}$ 等价，和等价，因此我们把社会最优问题转化成消费者最优问题：消费者要在预算约束 $\alpha I_g = I_{gk}$ 下选择自己的消费路径和资本积累路径来极大化自己一生贴现的效用和（这里隐含假设消费者长生不老，因为人们不断代际转换，因此这个隐含假设也是有道理的，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抽象的消费者长生不老）：

初始人均资本存量为

对这个问题可以定义Hamilton方程： $H =$

其中 λ 为Hamilton乘子，表示资本的现值影子价格，也表示在时刻一单位资本存量的增加所带来的最优效用的增加量。

我们得到最优性条件： $\alpha I_g = I_{gk}$

$\alpha I_g = I_{gk}$

TVC条件：

TVC条件则表示：在时间充分长时，资本的价值充分小。

四、进一步的分析

在均衡点，有。其中表示。我们在均衡点展开 $\alpha I_g = I_{gk}$ 得到：

令 $\lambda = 0$ ，
则，
所以
即 $\lambda = 0$

与这个二阶方程相联系的特征方程的根是。一根为正，另一根为负，因此是鞍点稳定的均衡点。对于任何已知的值，都有唯一的值，使系统收敛于稳定状态。令为负的稳定根，的解从开始，系统收敛于，就是。收敛速度由给定。

系统是鞍点稳定的，消费者只有一条最优消费路径达到这个均衡点，这条最优路径就是。由○6式，令 $\lambda = 0$ ，得到○7，与纯非国有经济的社会（其）相比，从○7知道，均衡时人均资本存量变小。由于，所以均衡时的人均消费量也变小。

从代入○1得到，用推导方程○3同样的方法得到○8。从○8得到：资本积累速度。与相比，资本积累速度也变小。

我们选取来分析，，稳态时有，得到

通过计算可以知道： $\lambda < 0$ ， $\lambda > 0$ 。从知道： $\lambda < 0$ ， $\lambda > 0$ 。

同理人均产出增长率

计算得知 $\lambda < 0$ ， $\lambda > 0$ 。由以上分析知：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有投资比重的提高可使均衡时的人均消费、人均资本存量、人均产出增长率变小；国有投资效率的提高（即的提高）可使均衡时的人均消费、人均资本存量、人均产出增长率变大。

所以在这个模型中，国有经济是以质的指标和量的指标共同按上述分析影响中国经济的动态发展的。

五、模型的政策含义

在这个模型的假定下，只要某行业存在经济效率、投资效率相对高效的非国有企业达到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国有企业开始亏损后，正常情况下，国家对这些国企的扶持只会起到暂时性的作用，长远看来只要国企不提高效率，这些国企迟早还是要亏损的，政府的扶持只能起到逆向配置资源的作用，那怕这些国企是大中型企业也是如此。因此“抓大放小”的核心应该是提高这些大国企的效率尤其是投资效率，而不是国家不断地从资金、政策上做出扭亏努力，让社会资源人为低效配置。政府干预国有银行贷款扶持国企，国企不提高效率（或提高效率的速度太慢，以至于效率还是低于非国企）而再次亏损，政府再次干预。这样不断循环下去，实质就是在不断空耗社会的资源。因此我们应该加快改革银行制度，政府不再直接干预经济，让非国企和国企平等地竞争，让社会资源按效率配置，这样既有利于非国企发展，也有利于国企的改革。

国企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国有企业（包括大中型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不过这个退出过程不应该是人为让它加快或减慢，而是国家不再干预竞争性领域的经济竞争，让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平等竞争，靠非国有企业的高经济效率迫使国有企业退出竞争型经济领域。如果目前的非国有企业没有这么大的竞争力，那么我们也不应该人为加快这个进程。也不能因为竞争性领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而人为阻碍这个退出过程。

（作者单位：山东建筑工程学院）

相关链接

中国国债对投资影响的绩效：回顾与反思
供给结构的调整与我国消费型社会的形成
关于我国矿产资源产权结构模式的探讨
从高新技术看落后地区的技术引进
上海高房价的主要原因探讨
招商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
国有经济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钢铁产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途径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